

他们改变了晚清民国史
写不完纯粹

潘竞贤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写不完 的纯粹

潘竞贤 著

他们改变了晚清民国史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不完的纯粹：他们改变了晚清民国史 / 潘竞贤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2

ISBN 978-7-308-15372-0

I. ①写… II. ①潘…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通俗读物 IV. ①K2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6240号

写不完的纯粹：他们改变了晚清民国史

潘竞贤 著

责任编辑 谢 焕
文字编辑 张一弛
责任校对 杨利军 田程雨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40千
版 印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372-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cs.tmall.com>

目 录

→ 迟到的强国梦	/1
一场奇怪的战争：专制和君宪的较量	/3
杨度：为了宪政，捉刀代笔做“枪手”	/9
袁世凯：小站其实并不小	/14
唐绍仪：民国首任总理为何撂挑子？	/21
同盟会：它的朋友和敌人都是清政府	/28
黄兴：留守穷城难为无米之炊	/33
汤化龙：立宪迷也热衷于革命	/38
→ 顶戴花翎的生意人	/43
难为李鸿章：骡马牵拉的“铁路”	/45
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的滥觞	/52
郑观应：善于经营的维新思想家	/58
周学熙：他面对的是一群外国无赖	/65
赫德：清帝国海关里的洋大人	/71
→ 革命时代的腥风血雨	/77
吴樾：碧血横飞的暗杀者	/79

大通师范学堂：革命党人的体校	/84
徐锡麟：三个人的安庆起义	/88
吴禄贞：志大气豪命如丝	/93
彭家珍：最后的刺客	/98
→ 历史深处的游魂	/105
千古奇谈：清廷与平民打官司	/107
赵凤昌：通天推手助产民国	/114
隆裕太后：一个背负亡国责任的女人	/121
伍连德：绝不应被遗忘的名字	/126
端方：铁路成了他的催命符	/132
→ 江山不幸诗家幸	/141
惊涛三万里：第一批远赴重洋的留学生	/143
陈独秀：在黑夜里燃灯	/149
盗火者：作为翻译家的鲁迅	/154
西学专斋：热衷教育的外国传教士	/160
蔡元培：一只空墨水瓶引发的学界风潮	/166
伍廷芳：民国第一案	/172
参考书目	/177
后记：谁说理想不靠谱！	/180

→ 迟到的强国梦

一场奇怪的战争：专制和君宪的较量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在中国的东北和黄海地区，爆发了一场奇怪的战争。

奇怪之处在于：交战国一方是君主专制的俄国，另一方是已经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后起之秀”日本，日俄两国交战，战场却在中国；中国的领土遭烧灼，中国的百姓遭涂炭，而清政府竟宣布严守中立。

当然，这场战争中也不乏中国人的身影。那时候，张作霖还是一介马贼，他给日本人充当密探和马前卒，因此发迹；也有人帮俄国做事，被日本兵抓住，当众砍了头，砍头的影片又恰巧让留学日本的周树人看到了，深深影响了这个心里背负着弱国阴影的年轻人，自此，他弃医从文，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笔名：鲁迅。

这场战争的结局出人意料：小小的岛国竟打败了庞然巨物般的沙俄帝国。这一结局，与十年前中日甲午之战何其相似！当年，弹丸之国狠狠击碎了大清的洋务自强之梦。当俄国军队在日本的枪炮轰击下节节败退的时候，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艰难的思考：日本，究竟凭什么成为胜利者？

思考的答案是：立宪政体！

辛丑年，在西安避祸一年的慈禧太后起驾回京之后，开启新政，为

此还专门设立了敦促新政的领导机构：督办政务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廷好了伤疤忘了痛，又在政治改革方面裹足不前，新政推行的效果甚微。不过，此时的言论管制已经宽松许多，“立宪”的话题早已不是禁区。在日俄战争爆发前，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已经对此作了充分的讨论。

清廷开启新政后，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喜出望外。两年前，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遭清廷通缉，而“六君子”的头颅纷纷滚落在菜市口。那时候，他们的主张被清廷视为大逆不道。梁启超没有想到，短短两年之后，清廷的变革举动比他们当初的设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大幅度的转变令人咋舌。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变革政体的重要契机。于是，他以“爱国者”为笔名，在他主编的《清议报》第八十一期，刊发了一篇题为“立宪法议”的长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阐述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这三种政体的含义和区别；他进一步指出，相比较而言，人类目前最理想的政体是君主立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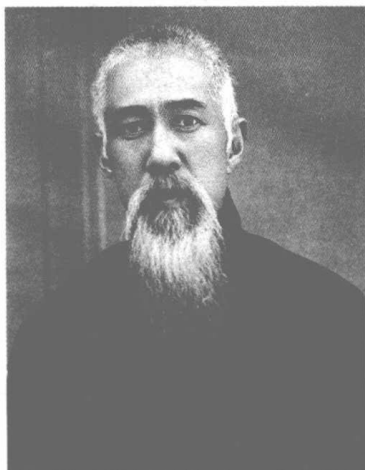
君主立宪，就是制定宪法，把无限的君主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君主立宪的政体下，君主虽然是社会的特权阶层，地位崇高，尊严至上，但是君主的权力不再具有专制体制下的无限性，而是受到宪法和议院的制约，君主的许多决定需要经过议院同意，君主不得为所欲为。这一政体的优点在于降低决策的失误，遏制野心家对权力的觊觎，调和君与民的对立，使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梁启超虽然不遗余力地呼吁立宪，但他并不主张立即变更政体，而是设计出一套“预备立宪”的方案：第一，皇上颁诏，在名义上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第二，派遣大臣赴各国考察宪政；第三，创设法制局，起草宪法；第四，翻译、出版各国宪法以及相关著作；第五，公布宪法草

案，征询全国各阶层意见；第六，达成立宪政体。

日俄战争尚在进行，驻法大臣孙宝琦预料此役俄国必败、日本必胜。他联合驻俄大臣胡惟德、驻英大臣张德彝、驻比利时大臣杨兆鉴上书朝廷，倡言变法。一个月后，他觉得意犹未尽，又单独写了一份奏折，呈给政务处。在这份奏折中，他重申了自己对日俄之战的预测——立宪的日本必将战胜专制的俄国。接着，他反观中国，认为自庚子年之后，朝廷虽然力推新政，但国家仍饱受内忧外患的滋扰，大小臣工敷衍塞责，国人精神倦怠，新政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他指出：造成这一结果的关键原因就是大清国没有与世界同步，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

孙宝琦单独上呈的奏折没有被政务处转给清廷的高层决策者，却鬼使神差地被上海的《东方杂志》全文刊发。这份杂志颇有影响力，奏折的内容被广泛传阅，其他报纸纷纷转载或评论，一时间舆论大噪，朝野震动。



孙宝琦



张 謇

孙宝琦是呼吁立宪的清廷大员，而与他遥相呼应的是身处江湖之远的张謇。张謇，字季直，江苏通州（今南通）人。甲午年，中日开战，

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文武官员跪在路旁，迎候慈禧。那天，天公不作美，风雨大作，官员们浑身湿透，双膝泡在水里。年过八旬的张之万也在迎驾官员的队列中，他是张之洞的堂兄，由于岁数太大，不堪久跪，不能起身。姗姗来迟的慈禧太后乘轿路过时，竟视百官若无物，轿子径直走了。刚刚在科举考试中夺魁天下、高中状元的张謇也跪拜在地，目睹此情此景，他心如死灰。一年后，42岁的张謇辞去官职，选择了做一名商人。

经营实业的张謇做得风生水起，1903年，他在家乡通州创办的大生纱厂已经颇具规模，资本雄厚。张謇平素热衷于教育和政治，他在这一年东渡日本，本是为了考察教育和实业，不料竟被日本的勃勃生机所打动，深切地感受到中日间的巨大差距。在他看来，这种差距正是专制与立宪这两种政体之间的差距。归国后，张謇就与汤寿潜、张元济、赵凤昌、张美翊等人研讨立宪问题，推动国内政治改革。

张謇在1904年先后编辑了《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宣传立宪的著作，书稿完成后，他委托在上海的老朋友赵凤昌印刷。图书印制过程中，张謇数次写信给赵凤昌，催问进展情况，急切之情表露无遗。书籍印好后，他广为散发，尤其是向清廷的高层，比如当时任兵部侍郎的铁良。赵凤昌也利用他的人脉，托人向皇宫送了十几本。据说，慈禧太后也读过《日本宪法义解》，她在召见大臣时说：“日本有宪法，对国家甚好。”不明就里的大臣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答，只好唯唯诺诺地应承慈禧。

日俄战事胶着之际，清廷重臣张之洞与魏光燾准备联名上奏立宪，张謇作为立宪派的领袖，受到了他们的召见，与他们一起详细商讨了起草奏折的事情。之后，他与蒯光典、赵凤昌、沈曾植等人历经数次商

讨，终于写成了奏折的初稿，之后又数易其稿，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张之洞读到定稿后，虽然通篇挑不出一句出格的话，但谨慎、持重的他还是没有立即将奏折呈送朝廷。张之洞劝告张謇：立宪的事情，应当先与北洋的袁世凯商议。

张謇与袁世凯本是老交情，他们俩曾同在吴长庆的幕府当差。吴长庆是淮军将领，他创立的庆军在对太平军作战中表现不凡。吴长庆好读书，爱人才，被时人称为儒将，他是袁世凯的伯乐，对袁世凯器重有加，特意委托张謇教袁世凯读书。不过，张謇似乎特别鄙视袁世凯的作为，离开吴长庆幕府后，张謇与袁世凯断交二十年。后来，袁世凯官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八九万北洋新军，深得慈禧太后信任，是清廷的实力派大臣。袁世凯是新政的积极推动者，他编练新军、派遣留学生、开办新式学堂、创建实业……政治影响力非同寻常。为了推进立宪事宜，张謇不计前嫌，主动联络袁世凯的亲信杨士琦，了解袁世凯的最新情况。之后，他致函袁世凯，劝谏他体察世界大势，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伊藤博文、板垣退助等人，主持立宪，成就伟业。袁世凯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当下立宪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没有采纳张謇的建议。不过，袁世凯很快复信，两人二十余年的隔阂逐渐冰释。

日俄战争最终以日本在海陆两个战场的完胜而告终。日本人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而中国的立宪主义者似乎比日本人还要高兴——战争的结果印证了他们的预测：立宪的日本必将打败专制的俄国。在立宪党人看来，这是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他们开始相信：宪政不再是洋人们的专利，国家的强弱之别不在于人种，而在于制度。日本可以通过立宪富国强兵，中国也一定能。俄国战败后，沙皇迫于国内压力，宣布立宪，这一举动深深触动了中国敏感的政治神经。

日俄之战的结局迅速点燃了国内立宪思潮的导火线。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战争结束后就刊载评论文章：“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上海的《中外日报》《时报》也纷纷鼓吹立宪。急迫的中国人简单而草率地将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归结为立宪对专制的胜利。知识分子奔走相告，报刊舆论也大力鼓噪，立宪思潮迅速激荡全国，上自大臣，下到学子，无不将“立宪”挂在嘴边。“立宪”一词炙手可热，俨然成了国人的口头禅。

在日俄交战期间，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也没闲着，各国极尽敲诈勒索之能，向清廷提出更多的权利要求。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也加紧了步伐，结党、起义、宣传革命思想……闹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的一栋普通民宅里，中国革命同盟会宣布成立，孙文被推举为总理。至此，星散的革命势力连成一气，建立了统一的指挥机构，孙文“一个人的革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内忧外患之下，慈禧太后的宫门不复宁静，奏请立宪的折子纷至沓来，如雪片般送到她的案头。1905年6月，张謇再次写信给袁世凯，从袁氏的个人安危荣辱着眼，敦促他支持立宪。这一次，袁世凯心动了，他联衔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向慈禧太后奏请立宪。瞿鸿禨与袁世凯在官场上是死对头，两人一向明争暗斗，互唱反调，但此时，瞿鸿禨也赞成袁世凯的看法，认为“我大清该立宪”。云南巡抚林绍年、



瞿鸿禨

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立宪的折子也接踵而至。皇族方面，庆亲王奕劻和他的长子载振支持立宪，一向主张改革的载泽自然站在了立宪一边。这些政治要人的意见深深影响了慈禧太后的决策。

1905年7月16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派遣官员出洋考察宪政。出洋考察大臣分别是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农工商部左丞绍英。他们官衔身份不一，载泽是皇族宗室，端方代表了锐意进取的地方改革派，戴鸿慈和绍英是掌管财政和商业的重臣，徐世昌是统筹军事的官员。他们都是清廷的重量级人物。9月24日，五大臣在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来到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即将启程之际，只听一声巨响，一个名叫吴樾的刺客引爆了炸弹，刺客当场死亡，五大臣受轻伤。爆炸声不仅没能阻止立宪的步伐，反而让清廷意识到立宪的必要与紧迫。自此，清廷在立宪问题上不再犹豫摇摆，而是大踏步地迈入了政治改革的深水区。

杨度：为了宪政，捉刀代笔做“枪手”

杨度在29岁时，被人保荐入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考试地点设在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保和殿。时值夏季，来自各省的青年才俊共计186位，端坐在殿内答题。

这里的“经济”一词，是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意思。

清廷在“庚子之乱”后，重启新政，戊戌年间被粗暴废除的改革举措大多得以重新执行。慈禧太后西逃回来，打心底里意识到变革的势在必行。要办新政，就得有懂新政的人才——方方面面的事情还不是人张罗起来的？

然而，就在几年前，慈禧太后还是谈“新政”色变。推动新政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的头颅在屠刀下滚落；光绪帝也因此被幽禁于中南海的瀛台。一场短暂而热烈的维新运动戛然而止。

谁能料到，短短几年后，大清帝国的政治走向突然急速转弯，重回新政的轨道。清廷一下子感觉到了新式人才的匮乏。传统的科举选拔制度难以满足新政对人才的需求，于是，清廷采纳了贵州学政严修在数年前提出的建议，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

参加特科考试的资格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的，必须由三品以上的官员保荐，皇帝亲自批准后，才可以进京考试。杨度是湖南人，保荐他的人却是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而非管辖湖南和湖北两省的湖广总督。这既是因为杨度早已盛名在外，也反映了当时官员的求贤若渴。

考试的结果下来了，杨度高居榜眼（一甲第二名），状元是广东人梁士诒。杨度和梁士诒后来既是同事又是政敌。后者在辛亥年出任袁世凯内阁邮传部大臣，参与了逼清帝退位的活动，在北洋政府时期任总统府秘书长、国务总理等要职。当时的主考官之一是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张之洞，他是很有声望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号香涛，时人尊称他为香帅。张香帅深深地记下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汉族重臣袁世凯联名推荐，使无一官一衔的杨度一跃成为四品京官。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榜眼杨度没有等来封官晋爵的诏书，等来的却是抓捕他的通缉令。原来，慈禧太后在召见军机大臣瞿鸿禨时，听闻此次特科考试有维新党人混杂其间。状元梁士诒的名字，被说成“梁（梁启超）头康（康有为）尾”（康有为号祖诒）。当时，戊



杨 度



梁士诒

成年的政治动荡余波未平，慈禧老佛爷依然对康、梁师徒恨得牙痒痒，心里还是很提防维新党人的。于是，一道要求查办的上谕传出，梁士诒、杨度及其他考生纷纷逃离京城。从金榜题名到被朝廷通缉的犯人，只在旦夕之间，命运的跌宕，怎不让人唏嘘喟叹！

犹如惊弓之鸟的杨度悄然乘坐前往天津的火车，去看望驻守在朝阳镇的伯父杨瑞生。杨度9岁时，父亲病故，他与妹妹杨庄一起被过继给伯父。伯父杨瑞生15岁就随父参军，征战南北，数度死里逃生，后因军功官至正二品总兵。

杨度逃离北京的第二天，爱才的张之洞就派人去天津请他回京——这可急坏了杨度的家人。他们误以为这是朝廷的追捕。四弟杨敞仓皇之间只得派两名仆人带上盘缠，分别守在北京丰台火车站和前门火车站。最后，守在前门火车站的仆人等到了杨度。仆人在出站的人流中看见了杨度，急忙冲上前去，将他拉上骡车，送到了不远处的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杨度曾自费留学日本，入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班，来自湖南的黄兴与他既是同乡亦是同窗。杨度与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素有交往。仆人把随

身携带的盘缠给了杨度。几天后，在使馆人员的帮助下，杨度乔装成日本人，潜出北京，乘轮船再渡东瀛。

避居日本求学的杨度潜心研读各国宪政理论，并且通过演讲、辩论和撰写文章的方式宣传宪政，因此成了声名远播的宪政专家。1905年，也就是杨度避居日本的第二年，清廷派出了由五大臣领衔的考察团出洋考察宪政。考察团兵分两路，户部侍郎戴鸿慈和湖南巡抚端方率领的一路考察团途经日本。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是该考察团的参赞，他也是杨度的湖南同乡。早在1897年，谭嗣同在湖南长沙倡办时务学堂，熊希龄就是该学堂的提调（即校长），梁启超则被聘为总教习。那时候，杨度开始对新学感兴趣，他经常去时务学堂蹭课，同去的还有后来的护国战争军事领袖蔡锷。杨度因此与熊希龄、梁启超熟识，他们时常坐而论道，指点江山。

宪政考察团在日本短暂逗留，熊希龄特意找到在此流亡的杨度和梁启超，不是为了叙旧，实在是要有要事相托——熊希龄在端方的授意下，请杨度和梁启超做一回“枪手”，为五大臣撰写宪政考察报告。杨度欣然答应，写下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篇长文。五大臣回国后，杨度的文章如期递送到端方面前，端方阅后，颌首肯定，斟酌润色后，呈送给慈禧太后。第二年（1906年），清廷根据五大臣的报告，下诏预备推行立宪。在内忧外患的合围下，清帝国终于小心翼翼地踏上了宪政之路。

1907年10月，秋风起，落叶黄，对杨度恩重如山的伯父突然病故，潜回湖南奔丧的杨度悲恸难抑，写下挽联：

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

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